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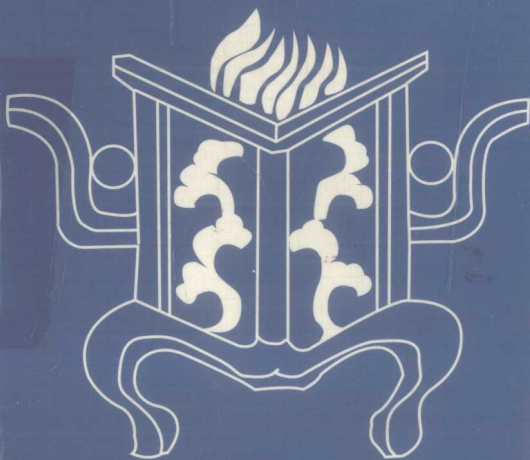
仡佬之源

政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宣教文史委编

“……仡佬……采砂爲業：婺川

縣有板場、木悠場、岩前坑產朱砂，其深十五六裏。土人以皮爲帽，懸燈于額，入坑采砂，經宿方出……土人倚爲生計。”

《貴州圖經新志·思南府風俗》



仡佬之源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辑

政协务川自治县委员会
宣 教 文 史 委 员 会 编

2005 年 5 月 · 务川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辑——

《仡佬之源》编委会

顾 问：王立亚 郑健勇

主 任：卢汝明

副 主 任：王明析 毕荣东 覃德江 刘永孚

赵发贵 廖承忠 谢启华 田茂富

成 员：邹先锋 田 业 王宗党 罗举贤

李维祥 邹圣朝 申茂凡 王治高

冯先政 邹友谊 邹愿松 覃义平

简良奎 赵伯鸿 罗来江 王庆华

蒋敬廉 李 忠

《仡佬之源》编辑部

主 编：王明析

编 辑：田 业 邹先锋 覃义平 简良奎

审稿校对：田 业 王明析

图片来源：

1、邹愿松 付 强 马 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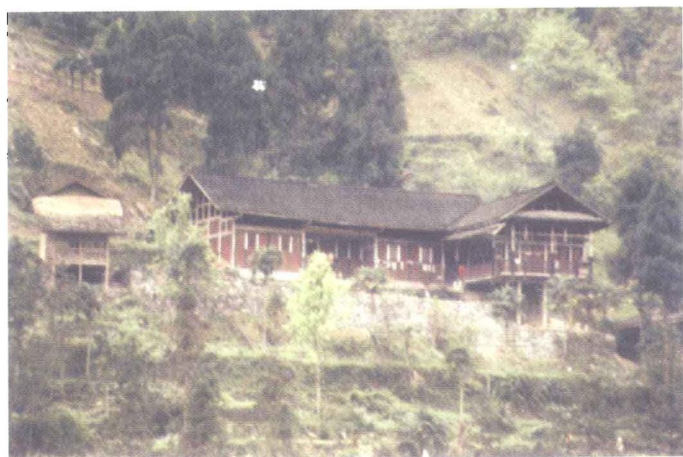
2、务川自治县对外宣传中心

3、《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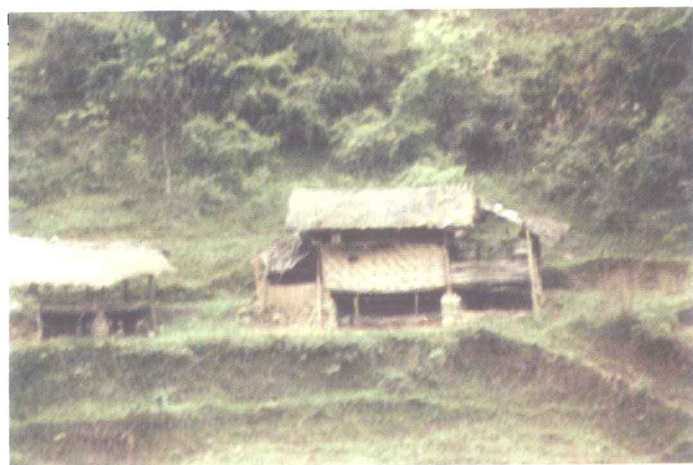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概况》



洪渡河畔的史前文化遗址
——丰乐院子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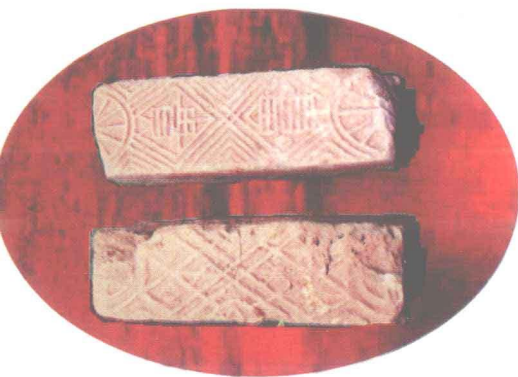


洪渡河畔的仡佬族干栏式民居



洪渡河畔的仡佬族干栏式民居

务川自治县出土文物——



汉·
砖

汉·蒜头壶



战国·甬钟

汉·提梁鼎



务川仡佬族岩穴葬



务川仡佬族石板棺葬



务川仡佬族石板棺葬





务川仡佬族墓葬石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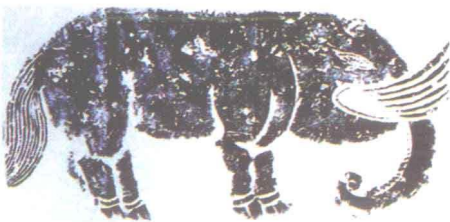


务川金银洞宋墓石雕拓片之一

务川仡佬族墓葬石雕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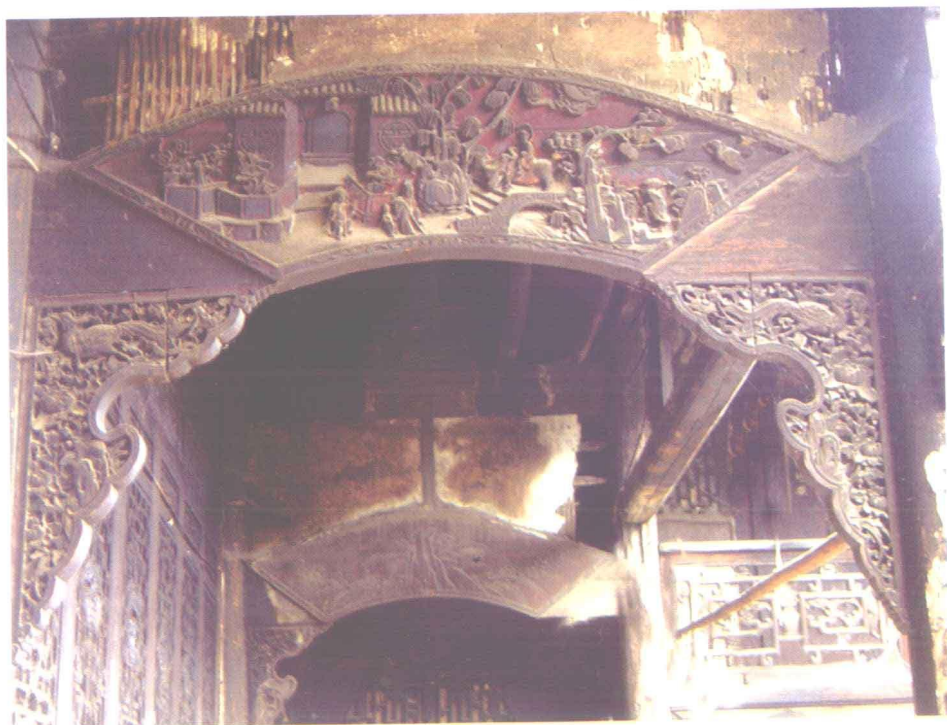
务川金银洞宋墓石雕拓片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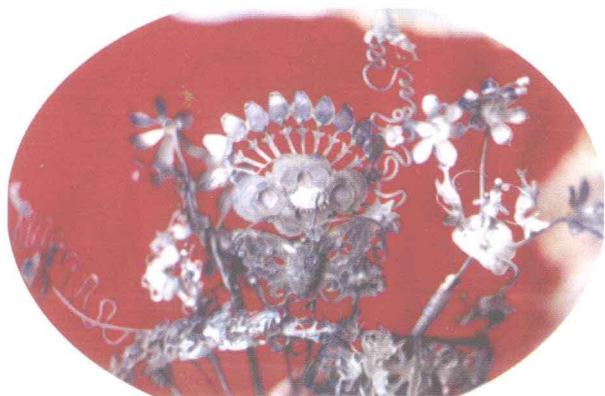


龙潭村仡佬族民居木雕——古代炼汞炉具模型

务川仡佬族民居木雕



务川仡佬族银饰勒子



务川仡佬族服饰·桶裙



务川仡佬族妇女发髻

务川仡佬族傩戏面具



务川仡佬族高台舞狮

务川仡佬族傩戏



务川大貳纸牌



和尚棋石刻棋盘

仡佬族舞蹈《淘盆打挂子舞》



为一个民族寻根

卢汝明

一段历史诞生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谱写一段历史。

仡佬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主要居住在贵州，是最早开辟贵州这片土地的先民之一。若干史料记述，许多遗存佐证，地处贵州东北部的务川，是仡佬族最早的家园之一。

务川是丹砂古县，自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县，迄今已逾1400多年。无论是置县之前的悠悠岁月，还是置县之后的漫漫时光，务川都因丹砂和水银而走进史籍。在我国，最早掌握丹砂提取和水银冶炼技术的民族是仡佬族。仡佬族的历史，离不开丹砂和水银。仡佬族文化与丹砂文化分割不开。仡佬族正是追寻着后来曾经照亮过中华历史一角的丹砂之光，开垦了务川，发展了自己。

同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一样，仡佬族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仅称谓而言，先后主要就有三种：濮人、僚人和仡佬。史料记载，仡佬族在商周到西汉时称为“百濮”或“濮”，东汉至南北朝称“濮”或“夷僚”，隋唐以后称“仡僚”、“葛僚”或“倕僚”，“仡佬”称谓最早见于隋黄闵《武陵记》，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中称“仡佬”后，仡佬这一名称逐渐固定下来。无论哪个时期，仡佬族总

是头顶丹砂那棕红的神秘光环。

2004年，贵州考古研究所在务川境内发现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这个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能否成为务川境内的仡佬族先民活动的佐证？专家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考证。是仡佬族先民留下的也好，不是仡佬族先民留下的也好，年代之久远，已经足够令人产生联想和发出感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大坪汉墓群，位于纵贯县境的洪渡河边。离汉墓群不远，就是古今丹砂和水银的产地。汉墓群一经发现，就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关注的目光。在这里，先后出土了战国时期的蒜头壶、甬钟、釜，先秦时期的半两钱，西汉时期的提梁壶、五铢钱，还有青铜箭镞、铜釜、铜铤、双面铜印以及大量汉砖等珍贵文物。据专家推测，这一带不仅埋葬着成群的汉墓，而且极有可能曾经有过一个颇具规模的旧时城池。果真如此，一定和丹砂有关，一定和仡佬族先民有关，只是不知道兴于何时，衰于何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仡佬族先民正是在这一带凿山开矿，提取丹砂，冶炼水银。因为有了丹砂，仡佬族先民才走出蛮荒，把足迹和足迹以外的东西留在中原。因为有了丹砂，其他民族的祖先才走进蛮荒，把生命和生命以外的东西留在务川。

仡佬族有自己的语言。务川的仡佬族没能留住自己的语言。在一个开化较早的区域，在各民族相互交流、沟通、融合的过程中，一个民族没能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完整地保留下来，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仡佬族别文化特征，务川的仡佬族应有尽有，比如服饰，比如民居，比如民风民俗……完完整整，原汁原味。

走进《仡佬之源》，为一个民族寻根。

是为序。

务川仡佬文化： 岁月风尘难以湮灭的历史

——《仡佬之源》思絮录

王明析

—

书名很雄心勃勃。为此，本书编撰之初在众多撰稿老师中曾引起过异常激烈的争议，而这种争议的余波在两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平息。但事实上，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初衷只是想编一本史料与学术兼备的文史资料，借以展示务川仡佬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而又独特的地域文化。

当初，争议的焦点最突出地体现在务川究竟是不是仡佬之“源”；更有极端者甚至还怀疑自治县的主体民族究竟是不是仡佬族，忧惧此书一出会贻笑大方或者被人非议，等等。尽管是学术之争，但它却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侧面提醒了我们编写本书的重要性与紧迫感。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也是治学严谨的一种表现，从他们后来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就可以鲜明地看出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在众多小心翼翼和犹豫不决的目光中，比较集中的关注对象是语言。透过这片疑雾弥漫的目光，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其中所隐含的潜

台词：务川连仡佬族语言都没有，怎么竟敢妄言是仡佬之“源”？

不错，斯大林曾为民族下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¹⁾一般的论者往往只从这四个基本特征的排列顺序上去轻易认定语言是最重要的特征，其实这并不正确。一般而言，每个民族在它的全体成员中都曾统一使用、或统一使用过某种共同语言。这种民族共同语言往往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最初只在一定的地域使用和流行。当使用这种方言的地方是某个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时，它便会很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统一使用的共同语言。例如现代汉语的形成与规范，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占有优势，公元1234年蒙古人定都大都（北京）后，虽明文规定蒙古话是国语，但实际上蒙古的老百姓和王公贵族都喜说大都话，这便使大都话作为“强势语言”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等到明清两代定都北京，来京的官吏、商人和赴考的举子，再把“官话”（北京话）慢慢地传到全国各地，现代汉语才逐渐初步定型。到后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才最后形成于五四时代。笔者举此例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外，还要想说明的一点是：蒙古话在元王朝的明文规定下尚且未能得到很好的推广，偏居西南“蛮夷之地”，处于弱势地位的仡佬族语言面对强大的北方话的冲击，声音逐渐微弱乃至慢慢消失殆尽，其实并不奇怪。

很多人都认为仡佬族没有文字，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本

文现在不探讨、也无力探讨这个极其专业的学术问题⁽²⁾。但史料记载仡佬族是有语言的，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2003年12月，我们曾组织本书部分撰稿人员赴外考察。当考察人员来到贵州省六枝特区的居都村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一千三百多仡佬人，无论男女老幼，日常生活竟完全以仡佬语交流。“他们中的老人、妇女和学龄前儿童，只懂本民族语言，不懂汉语。”仡佬语在居都村之所以能保存如此完好，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封闭”，地形地貌独特⁽³⁾。而务川这块重要的仡佬文化发祥地，却因中原文化的浸染较早⁽⁴⁾，致使包括语言在内的很多独特的文化习俗都消失或模糊了。现代汉语（主要是书面语）虽然在务川取代仡佬语成了“通用语”，但构成仡佬语主体部分的一些方言仍顽强地存留在这块古老的土地，尤其是在一些边远的乡村，很多言简意赅而又生动的方言仍大量出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词汇我们甚至不知其写法，因为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还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声母。这类词汇，我们是能读其音而不能写其文。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说，历史研究中应该有“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象”⁽⁵⁾。据此，笔者大胆揣测：这些至今仍活跃在务川人民群众口头的方言词汇，应该就是仡佬语作为一种主体语曾经在务川被广泛使用的明证。例如，活跃在务川方言中的典型词汇有一个读音为“bour”的词，发音为平声，大多数时候它带儿化音，但在柏村等地它又无儿化特点，且读音很重。它的特点是与指示代词连用，如“这bour”“那bour”“走哪bour去”，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就是“这里”“那里”“去哪里”。“bour”的读音缘何而来，笔者不揣浅陋，在这里提供一种大胆的猜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北方话（即下面引文中所指的汉语）“部落”